

《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 与含混性》读书随笔

Notes from Reading *Plurality and
Ambiguity: Hermeneutics,
Religion and Hope*

康 心 中国人民大学

Kang Xin, Renmin University China

343

[**Abstract**] David Tracy is a well-known contemporary Catholic theologian. *Plurality and Ambiguity: Hermeneutics, Religion and Hope* is a small book he wrote in mid-career with dialogue as its main theme. In the book, Tracy's clear and incisive pen discusses hermeneutics, which interprets the principle of the interpretation. He analyzes and reflects on the high degree of ambiguity in language and the high degree of pluralism in history. He explores the ways to recover meaning and truth in the postmodern world, and concludes that the best forms of religion can provide the power needed to bring hope.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comments on Tracy's book to help readers grasp the logic and essence of his thinking more efficiently.

现任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教授的大卫·特雷西(David Tracy)作为

当代著名的天主教神学家,始终关注基督教神学与后现代处境之间的关联,注重解释学发展和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创立了神学诠释学体系,并突出其涵盖性、包容性和整合性,跨越与整合科际对话,致力于拓展真正普世的(ecumenical)神学。其主要著作《秩序的神圣愤怒》、《类比的想象》、《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和《与他者的对话》等对神学和人文学界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西方社会进入现代与后现代以来,神学不再能只作为小范围的信仰群体处理的对象,它开始进入人文学领域,成为文化和社会所处理的公共课题之一。因此特雷西的神学系统的社会性关联构想强调了他对神学“公共性”和“应用性”的关注。这一系统建基于神学的三个传统分科:基础神学、系统神学和实用神学。在特雷西看来,这三个分科又关联了我们时代的三个公共空间:学院、教会和社会,并通过这种社会性的关联表明了三个分科的独特性质:理性之于基础神学、信仰之于系统神学和实践之于实用神学。^①特雷西前期的两部重要作品《秩序的神圣愤怒》和《类比的想象》可以说正是在这一系统之下的,一部是哲学性的基础神学,一部则进展至建构性的系统神学,但是至《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特雷西并没有按照他的计划完成实用神学的著作,而是在这里发生了思想上的焦点转移。随着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争论,一切传统和价值都处在前所未有的质疑和诘问之中,意义沦为解释和观点,在极端的多元与含混的现代处境中,如何重新确立意义以及真理?面对这种现代西方文化的危机,特雷西在本书中以清

^① 陈佐人,《〈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中译本导言》,见特雷西著、冯川译,《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9-10页。

晰简洁的文笔对后现代多元处境进行了整理和反思,对阐释人类解释活动原理的“诠释学”进行了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最好形式的宗教作为抗争力量带来的希望。因此正如陈佐人所说:“故此本书的独特重要性,是其表征了特雷西以及许多共同在后现代多元化处境中思考神学的思想家,所必须经历的思想中断与绕道而行,先寻求在解释冲突中的诠释原理,以及先明了我们时代多元性与含混性的形成原因,然后才可谈得上直接从事建构神学的工作。”^①

正如特雷西在绪言中提到的,本书的论题是对话。围绕对话这一范型,特雷西分析了对话中具有多元性和含混性涉及的若干问题。

首先特雷西具体分析了何为解释,面对现代与后现代之争,诠释学何以成为在此处境中思考的最佳方法之一,以及作为解释模式之一的对话如何发挥作用。在特雷西看来,解释不仅是被我们忽略的每天习常的生活活动,更是我们存在确立的必需。成为一个人,像一个人一样生活,就是不断地对自己所处的世界作出解释,以此来把握、占有,消除焦虑和不确定。“解释活动因而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并最终如同经验、理解、思考、判断、决定和行动一样不可缺少。所谓达到人性水平(to be human),指的就是思而后行,谋而后断;就是聪颖地理解,充分的体验。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成为一个人(to be human)即意味着成为一个技艺娴熟的解释者。”^② 所有的事件、文本、象征、运动、人物和仪式都隐

^① 陈佐人,《〈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中译本导言》,见特雷西著、冯川译,《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12页。

^② 特雷西著、冯川译,《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14页。

藏着需要我们去探寻的种种论说(discourses)结构和精神状态,由它们所形成的包含着深邃多元性和含混性的传统塑造了我们,并且,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至今仍对我们发生着影响。要想弄清我们自己和我们所处的后现代处境,就必须敢于冒险去对这些事件、文本等做出解释。然而,处在文化危机的时代,我们发现旧有的那些理解和实践方式,甚至经验本身,已经不再有效。这种不安和焦虑自然会驱使我们去寻找自己解释世界的方式,而这种寻找首先即是对解释过程的反思。“为了能够根本的理解,我们必须去解释。我们甚至可能发现:为了理解,我们需要对理解即解释(understanding - as - interpretation)这一过程本身作出解释。”^①

任何解释活动都至少涉及了三个方面:“某种有待解释的现象、某个对那一现象进行解释的人,以及上述两者之间的某种相互作用。”^② 在这里特雷西插入了他对“经典”(classic)的著名论述。作为影响我们的解释方式和我们解释方式的纪录,作为文化变迁与转移的中介者,在文化危机时代,我们首先要考察和反思的就是这些范例性的文本。文本表面的稳定性与实际的不稳定性、表面的自主性与实际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都揭示了有待解释的现象所具有的内在复杂性。经典文本作为典范的范例,不仅帮助建立和形成一种特定文化,更因其拥有过剩和持久的意义(permanence and excess of meaning)总是拒绝定论性解释,永远处在变化的接受过程中;其个别独有的生产过程和表现方式与具有普遍可能性的影响效果间的悖论,都使之成为诠释学理论最典范的

^① 特雷西著、冯川译,《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11页。

^② 同上,第16页。

例证。“我们很难忽略经典对我们注意力提出的真实。”^① 经典文本抵制我们深染的惰性和自满，它不会轻易被驯化为相似性和纯粹的同—性，它使我们被迫承认文本中的“它性”(otherness)，要求我们专注于它们，包括从“激进地认同于经典对真实性的要求，一直到以某种尝试甚至犹豫不决的态度去与其中的它性发生共鸣。”^②

特雷西接着将待解释的对象与解释者之间的相互运动——对话——比作游戏或比赛(play)，因为任何相互作用都包含了某种运动，在这相互作用中运动是主导，它将运动者从他们平时的自我意识中解放出来。“正是在这种游戏中使我们学会了投入到值得探究的问题所要求和需要的运动中去。对话中的运动即是询问。”^③ 问题支配着对话这一运动，“对话不是对垒，不是辩论，不是考问，而是追问。对话是自愿追随问题而任凭它把我们引向哪里。对话就是对话(dialogue)。”^④ “在追问中放弃自己意识，唤起自己对对象的关注并且探索由他人提示的种种可能性，即意味着在对话中发现自己，形成自己和检验自己。”在追问中探索种种可能性，就必须容忍差异和“它性”(“与经典文本相互作用意味着与差异性和‘它性’对话。”^⑤)，而这种承认和容忍也就意味着把差别理解为“可能”的、认识到“可能性”即是我们感到这种“差别”或“可能”与我们已经经历和理解过的事有某种相似性，即“差异中的相似”(similarity - in - difference)，也就是“类比”(analogy)。由此，特雷西

① 特雷西著、冯川译，《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24页。

② 同上，第25页。

③ 同上，第29页。

④ 同上，第30页。

⑤ 同上，第33页。

引入了他“类比的想象”(an analogical imagination)的概念(一种经过训练因而能够与这种“差异中的相似”相遇的想象),并认为任何优秀的阐释者都具有这种“类比的想象”,它提醒我们,只有在允许和容忍差异,并因而敢拿自己去冒险的时候,解释才有可能,对话才会发生。因此“理解即为阐释;而阐释则为对话。”^① 对话既然具有天然的开放性,那么“唯我论乃是交谈和对话的大敌”^②,因此辩论虽然必要却不能取代探索式的对话,“对话是无所不包的实在(encompassing reality),只是在这实在中,所有好的辩论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论辩从属于对话,而不是对话从属于论辩。”^③;也是经由这种开放性,才有可能性的发现,因此在阐释活动(对话)中,“我们永远不可能拥有绝对的确定性”^④,而只能达致相对充分的解释。

在第二章中,特雷西分析了古代的论辩方式如何转变为现代的理论、方法和解释,而这些理论、方法和解释又如何转过来可能中断了传统意义上的对话。对话这种阐释活动是对真理即显现(manifestation)这一真理观的恢复。当代诠释学中,海德格尔的真理即显现(开敞—遮蔽[disclosure-concealment])和伽达默尔的强调真理是具有开敞作用的事件,都是和对话的开放性息息相关的。“对话式生活的第一个成果便是发现了真理即显现。没有真正的交谈,也就没有显现。没有显现,也就没有真正的对话。……对话既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又是所有人类生活具有的对话性质的

① 特雷西著、冯川译,《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33页。

② 同上,第42页。

③ 同上,第40页。

④ 同上,第37页。

显现。……经由这种交谈，我们体验到那些因我们愿意对话和因经典具有开敞力而得以显现的真理。”^① 当阐释者声称认识到了某种显现，即隐晦的声称对那种阐释有了相对充分的根据。辩论于是由此展开。经由辩论，作为原始显现的真理成为有根据的一致协议再成为相符一贯性 (coherence)，现代科学主义的困境即是：“将所有的对话和交谈化简为辩论，将所有的论题辩论 (topical argument) 约化为形式辩论 (formal argument)，并通过用现代纯形式的有效性要求取代古代对真理提出的要求来否认任何显现出来的真理。”^② 因此我们用以抵抗这种形式主义逻辑的资源便是通过重新修复对话作为通向真理之路，将真理重新理解为“开敞—遮蔽—认识的相互作用”。

特雷西反思了启蒙主义，认为理性蜕变成了形式理性和技术理性。科学主义影响了我们文化的方方面面，方法论似乎已主宰了我们现在所有学科，“以致几乎每一种经过训练的追问和研究都不时试图凭藉某种释解方法来结束种种解释之间的冲突。”但是科学自身的诠释学性质和历史性使其赖以支撑的观念体系已遭到思想上的破产。在反思科学主义的同时，特雷西也提醒我们警惕浪漫主义的新一轮循环。“所有这些诠释学研究同时也是向方法论、说明论和理论性研究敞开大门的。”^③ 现代的方法、说明和理论确实会使我们与原始的参与感拉开距离，但距离不一定意味疏离 (alienation)，对于对话和交谈，这种中断往往是必需的。“理解应该包涵所有的解释。然后说明、方法和理论却可以发展、纠正和向我

① 特雷西著、冯川译，《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47页。

② 同上，第50页。

③ 同上，第57页。

们最初的理解提出挑战。”^① 通过对历史批评和文学批评方法的具体分析,特雷西强调“一切学科均具有阐释学特征”^②,而“阐释学本身就坚持主张所有的理解均具有语言学特征”^③,因此“所有的理解都完全是语言学的”。^④

接下来的两章中,特雷西具体分析了中断现代性的两种力量:“语言学转向”带来的极端多元性和现代历史意识中对话的极端含混性。所谓“语言学转向”即是“对语言、知识和现实中极端的多元性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具有中断性质的探索”^⑤,从早期的将语言视为工具性的到认识到语言的社会和历史性。现实,甚至真际,不再处在前语言状态是形而上的绝对自体,而是经由相对充分、相对真实的解释构建起来的。我就在我能使用的语言中,我从属于我的语言,语言包围我并侵入到我所有的经验、理解、判断、决定和行动中。“通过语言,我发现自己参与到这一特定的历史和特定的社会中来。”^⑥ 语言学转向向工具主义的语言解释提出挑战,不仅意味着重新进入历史与社会,也意味着纯粹自主自我的统治观念的让位和对它性、差异的承认。“我们是语言的、历史的、社会的存在”^⑦。特雷西将语言学转向具体分为三个阶段: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和生活形式不可根除的多元性的分析)和海德格尔(对语言每一开敞所具有多元性的阐释)是把语言作为运用,在这里他们坚持

① 特雷西著、冯川译,《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57页。

② 同上,第66页。

③ 同上,第68页。

④ 同上,第71页。

⑤ 同上,第77页。

⑥ 同上,第81页。

⑦ 同上,第82页。

了“多元性和差异性总是出现在一切真实的话语和言谈中，根本的差异是不可能被消灭的。”^①——把语言作为对象，这一阶段包括索绪尔和结构主义者从特定的言说行为中抽象出系统语言，仍然将意义的自我呈现寄托于单一的符号和某个封闭的系统；也包括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将语言作为差别组成的非系统，用“延异”和“分散”是完整呈现的确定意义成为破灭的虚幻希望——把语言作为话语。通过特雷西称之为“言谈分析者”的利科、哈贝马斯、福柯和拉康等人把语言作为话语的分析，对语言、知识和现实的诠释超越词汇回到了文本，对实际语言的关注又以新的形式回来了。我们需要认识到，语言不仅是思想的载体，也关联着存在与真际；我们不仅需要像结构主义者一样分析语言的所指能指和系统，还需了解语言作为一种关涉真际的“言谈”或“语境”（discourse），像“言谈分析者”一样探索语言作为人存在的社会学、心理学与诠释学的语境功用。通过对言谈的分析，我们可以在解构主义宣称一切完整呈现的绝对意义都只是幻觉、一切都是差异和不同的时候，坚持对话和辩论的希望，坚持知识的可能。“我们不再相信纯粹的自我呈现，不再要求确定性，不再要求明白的、毋庸置疑的知识。然而，不再相信这一切却并不意味着否认知识本身的可能性。我们知道我们的知识具有相对充分和足够的可靠性，我们也知道它受到语言现实、社会现实和历史现实的限制。在任何特殊问题上，当我们不再有与之相关的疑问时，我们就算是认识了这一问题。因此，当知道得足够多的时候，知识是可能的。”^②“把语言作为言谈来研究，意味着去发现多元性，意味着去重新发现历史与社会的

① 特雷西著、冯川译，《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84页。

② 同上，第100页。

偶然性和含混性。同样,对语法和修辞进行研究也意味着发现多元性,意味着与古代人一道去重新发现道德与政治的统一性。”^①

“语言和历史不可分割的交织在一起。”^② 和语言的极端多元性一样,历史也远比我们所认为的更复杂、意义更含混。“历史不仅是偶然的,而且是被切断的(interruptive)。整个西方史,完全就是一个断裂的、没有单一主题也没有主要情节的故事。”^③ 我们必须面对插入我们历史中来的种种中断性的突发事件,我们也的确属于这些事件。“含混性在认识上意指真与假;在道德上意指善与恶;在宗教上意指神圣与魔道(the holy and the demonic)。”^④ 历史的含混性在于它混合了巨大的善和可怕的恶,无论乐观主义还是悲观主义都不能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历史的多元性和含混性,“抵抗、专注和希望是更为可取的策略。”^⑤ 要获得这种力量首先我们可以从经典文本中重新发现,经典要求我们的专注和对“差异”的承认,“首先,我们应该学会倾听他人的叙述,特别是那些曾蒙受我们强加的排斥,而不能去对自己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典作出应有解释的‘他者’(others)的叙述。经由所有这些彼此冲突的策略,我们至少会认识到:西方式自我中心的偏移,同样会导致欧洲式历史中心的偏移。而这种对我们自己的抵制和拒斥同时也正是希望之所在。”^⑥

或者我们可以通过研究任何可取的、有关自我与社会的现代

① 特雷西著、冯川译,《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106页。

② 同上,第107页。

③ 同上,第111页。

④ 同上,第114页注①。

⑤ 同上,第118页。

⑥ 同上,第119页。

批判理论获得这种抵抗的力量。批判性理论是指“那些证明了认知性思考能够使人觉悟到体系性扭曲——无论是个体的或社会的体系性扭曲——并通过这种光照而召唤某种解放性行动的理论。”^① 现代意识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理性意识上。这种西方理性观中的乐观主义认为我们面临的问题知识意识偶尔的错误而已，“自主成熟、条理一贯的现代自我在其不可抗拒地走向进一步启蒙的过程中，无疑能通过发现更好的理性讨论和理性对话来处理 and 纠正所犯的 error”^②。但是后现代的立场洞察到现代理性意识非常脆弱、易碎，“现代自我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真正成问题的是某种比单纯的错误和过失更基本的东西；我们需要的是某种比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更刚强的东西；我们需要怀疑的巨大偏差是某种比弗洛伊德或马克思分析过的体系性扭曲更为巨大的东西——那就是罪与无明。”^③ 将我们现代生活的问题认识为错误还是系统性扭曲，正是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根本差别。

知识和所谓的实在都与语言相关联，随着语言学转向，历史和社会作为突然插入的现实，现在又重新进入到我们意识中来。“所有的经验、所有的理解都具有诠释学性质。”^④ 我们生活在文本互相关性(intertextuality)之中，意识本身就具有极大的文本互相关性。“后现代分裂的自我被套在自觉意识到的活动，和不仅围绕在我们周围，而且就在我们自身之中的极端‘它性’之间。”^⑤ “‘它性’已经进入我们自身之中而不再是外在地处在‘他人’之中。最大的它性

① 特雷西著、冯川译，《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132页。

② 同上，第122页。

③ 同上，第125页。

④ 同上，第127页。

⑤ 同上，第127页。

是内在的它性、除非我们承认这一点,否则我们就不能负责任地介入我们的历史,或又意义地从属于我们的历史。”^① 所有的一切(我们自己、我们的文本、我们和文本的对话)都受到含混性和多元性的深刻影响。言谈中它性的声音在不断增强,20世纪对语言和历史的诠释从维特根斯坦到德里达再到利科等“言谈分析家”,我们发现“我们的言谈不仅扩散着,而且就在其自身中承载着自已意义含混的全部效应。”^②

宗教正是借助对错误、对理性意识、对自我这种乐观主义憧憬的拒斥和抵制来实现它对现代性的拒斥的。基督教中罪的概念和佛教中无明的概念使我们认识到这种体系性的扭曲,使我们不再执著于自我这个幻想,使我们认识到多元与含混并学会倾听,由此包孕专注和希望。

“宗教的主要抵抗是反对同一性。”^③ 要使宗教的抵抗策略有所应用,就必须与宗教经典作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即神学诠释。首先我们必须明白的是,神学诠释和其他所有诠释活动一样,都是不确定的、试探性的追问方式,同样只能追求相对的充分和足够。特雷西并不将神学视为可不受检验的保护区域,“作为对终极实在的思考和反映,作为对存在之有限性的思考和反映,神学诠释也如所有其他诠释活动一样,必须始终是一种高度冒险的和不确定的追问方式。神学家永不可追求确定性,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以只能以试探性的方式追求相对的充分和足够。神学家也逃避不了影响所有言谈的多元性和含混性。他们也只有通过对所有宗教上的终

① 特雷西著、冯川译,《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129页。

② 同上,第133页。

③ 同上,第137页。

极希望作批判性的检验来试着憧憬某种可以信仰的希望。”^①但他同时也肯定了神学诠释的特殊，既然是对终极实在的言说，不论哪种宗教，终极的就必然意味着彻底的它性的差异。

特雷西坚持宗教(神学诠释)必须进入公共领域，坚持宗教的公共性和应用性。宗教和艺术及思想个体性的代价将是：“所有的经典将被那些懂得权力游戏的人——所有宗教中那些伪装虔诚的官僚，艺术圈子中那些沽名钓誉的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官方的知识宠仆——集中起来置放在无害的精神保护区中。”^②宗教经典和其他所有读解一样受到社会和历史的影响饱含多元性和含混性，因此它必须要求真正的对话，要求我们去重溯、批判和怀疑，要求接受、批判和共契，这不只局限于宗教信仰者，任何对宗教问题或极限问题(limit question)进行追问和思考的人都在对话。因为宗教问题关涉着我们所有知识、意愿与行动中最基本的前提、假设和信仰，“宗教问题追问终极实在之意义和真实性时，不是将其作为孤立的自在来追问，而是将其作为在生存上与我们相关联的来追问。”^③所以“宗教经典同样能够向非宗教信仰者的阐释者见证抵抗和希望。”^④宗教阐释上的多元性不仅仅相当于宗教本身的多元性。也不仅是宗教间的多元性，甚至是每一宗教之中的多元性。但是在可能性和开放性之外，特雷西仍强调一定还存在着其他标准。“宗教上的多元论者因其对多元性的肯定而基本上相信多元主义，然而，他们却并不逃避形成种种评价标准以便作出相

① 特雷西著、冯川译，《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139页。

② 同上，第176页。

③ 同上，第143页。

④ 同上，第144页。

对充分的判断的责任。”^① 因此与宗教对话必然是困难而艰巨的任务。特雷西提出“类比想象”作为一种启发式的和多元论的策略来帮助宗教间对话和对每一宗教中多元性的思考。真正的对话总存在一种相互转变的开放性,是试图将实际的不同阐明为具有真正的不同又与我们那已知的事物相似。“类比想象(相似性想象)意味着愿意进入对话,愿意进入不安全的领域,并通过对不同于自己的人 and 事给予足够的注意而拿自己对自己的全部自我理解去冒一场风险。”^②

宗教的应用性就在于“任何阐释作为阐释都是实际应用中的一种操演。”^③ 不同宗教在言说终极真际时,使我们觉悟到自我这一多元含混的实在变得有限、陌生和虚弱。这即是自性(the self)的转变,从自我中心转为以真际(绝对的他者)为中心。自己拥有唯一的解释权是学院派神学家的自我和后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共同拥有的幻觉。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选择性的同情,被压迫者的读解必须予以倾听,倾听是为了一种严肃的、批判性的反映或积极的结合,即真正意义上的对话。通过倾听我们承认自己言谈中权利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具有含混性,通过倾听我们可以学会使自己变得不再是疏离的自我,“而是一个与所有我们一直假定我们是为其说话的他人团结在一起的人性主体。”^④

因此特雷西最后总结道:“所有那些对我们处境进行阐释的人,所有那些意识到我们需要团结一致的人,都可以继续冒险对所

① 特雷西著、冯川译,《诠释学·宗教·希望——多元性与含混性》,上海三联书店,1998,第148页。

② 同上,第152页。

③ 同上,第163页。

④ 同上,第168页。

有传统中的所有经典进行阐释；而在这种阐释的努力中就蕴涵着抵抗和希望。”在对话中理解、在共契中行动、在抵抗中希望，这不仅是宗教给予信徒和非信徒提供的信靠和希望，也是特雷西为我们提供的在后现代语境中如何坚持意义的追寻和生活的方式。